

满大人作家画像：巴尔扎克 1842 年前后作品中的中国*

〔法〕白纯相 撰 许玉婷 译

摘要：本文将巴尔扎克于 1842 年为朋友、艺术家博尔热的画册所著同名书评集《中国与中国人》与《人间喜剧》加以对照，说明 1842 年前后巴尔扎克作品中“中国”一词的含义没有实质的变化，主要指“别处”、“精致”以及“财富”，由此进一步论证，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中国不是博尔热所呈现的现实的、简化了的中国，而是他想象的中国，是他童年时从自己的父亲以及耶稣会士格鲁贤神父那里继承来的中国。中国是作家的投影，通过在作品中呈现中国，通过购买中国工艺品，作家在文学和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的中国宫殿，从而让自己成为法国的满大人。

关键词：巴尔扎克 中国 别处 精致 财富 满大人

1842 年是巴尔扎克创作史上继往开来的一年，他的全部作品在那一年结集出版，题为《人间喜剧》。1842 年也是中欧关系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帝国，并向西方开放了五个港口作为商埠。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巴尔扎克发表了他为奥古斯特·博尔热的画册《中国与中国人》撰写的书评。然而，巴尔扎

* 原文标题 *Portrait de l'écrivain en mandarin: La Chine dans l'œuvre de Balzac avant et après 1842*，作者白纯相（Véronique Bui）为法国勒阿弗尔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作者 2017 年在勒阿弗尔-鲁昂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巴尔扎克与中国 / 中国与巴尔扎克》（*Balzac et la Chine/La Chine et Balzac*）之摘要。本文应钱林森教授之邀，作者授权并过目发表（译者注）。

克的书评出乎意料，没有像一般书评那样，对画册作一番形象描述（ekphrasis）后再进行评论，而是辛辣地讽刺了路易·菲利普政府。他时而抨击菲利普政府平庸无奇的对华外交政策——法国在中国鲜有作为，时而批评殉道者法国传教士所做出的牺牲，时而批判法国对英国人敞开的贸易之路。除了这样的批判，他和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一样，将人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书写，法律，艺术，货币体系，社会组织……）与人们在法国的所见所闻加以比较，从而更好地褒扬中央帝国，更加肆意贬低他嘲弄地称之为中庸帝国的法国。他的系列文章发表在1842年10月14日、15日、17日和18日的政治性日报《立法机关》上，这些文章言辞如此激烈，以至于成为他“最骄横无礼的文章之一”^①——按照帕特里夏·博杜安在其博士论文《作为政治思想家与记者的巴尔扎克》中的话来说。

这四篇文章^②结集出版，标题简短，名为《中国与中国人》，学界很少有人问津，这同样出人意料。这些文章被忽视了：玛丽-艾娃·泰朗迪的文集《记者巴尔扎克》^③没有收录，《巴尔扎克与政治》^④以及《地理学家巴尔扎克》^⑤、《旅行家巴尔扎克》^⑥都没有对《中国与中国人》做一番批评。然而，这些专栏文章表明小说作家对天朝具有浓

① 帕特里夏·博杜安：《作为政治思想家与记者的巴尔扎克》，在线博士论文，第208页。

② 帕特里克·莫鲁斯在巴别塔文丛中为《中国与中国人》作注、写序，附在2006年出版的《从巴黎到爪哇的旅行》后面。除了这个版本，只有2012年第21—22期的《巴尔扎克通讯》刊载了全文，由艾尔维·庸核对、作注；该文本后面附上一系列研究论文：艾尔维·庸的《〈中国与中国人〉之出版史》；韦罗妮克·布伊《转向的历史：评巴尔扎克〈中国与中国人〉》；艾尔维·庸《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所阅读的有关中国的书》；安娜-玛丽·巴隆《巴尔扎克眼中的犹太人与中国人》。

③ 《记者巴尔扎克》，《文章及专栏文章》，玛丽-艾娃·泰朗迪编选，卡尼尔-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14年。

④ 《巴尔扎克与政治》，波利斯·里昂-卡昂、玛丽-艾娃·泰朗迪主编，克里斯蒂娜·皮罗出版社，2007年。

⑤ 《地理学家巴尔扎克》，《版图》，菲利普·杜弗尔、尼古拉·莫泽收集与主编的论文集，克里斯蒂娜·皮罗出版社，2004年。

⑥ 《旅行家巴尔扎克》，《历程、旅行、位移》，尼古拉·莫泽与保尔·佩蒂耶编选，图尔：弗朗索瓦·拉伯雷大学出版社，2004年。

厚的兴趣。何止是兴趣浓厚，他简直是一个中国迷，这在他那个时代确实叫人吃惊。由于耶稣会士对中国所作的描述充满溢美之词，18世纪的显著特征便是对中国及其文化、文明、文学当然还有哲学^①——这是启蒙时期题中应有之义——无比痴迷，然而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人对中国兴趣锐减。画家与云游四方的艺术家感兴趣的是浪漫主义东方，远东一词还没有出现在词典中^②。

为什么巴尔扎克如此牵挂中国？这个国家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作家一向讨厌使用“我”来叙述，竟然在此违反参照性写作的规范，使用第一人称，谈及自己的童年“颇受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熏染，因为有一个至亲热爱中国这个奇怪的民族^③”。另外，为了表达他对博尔热所持立场的厌恶，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作者将这本书献给法国国王，我不喜欢这样的题献。”^④巴尔扎克在此使用第一人称，表明了他积极介入的态度，其特征鲜明，发人深思，有别于他的小说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在1842年，中国还不是能够引发争议的话题，法国派出驻华大使拉萼尼也是两年以后的事情。法国人围绕在华行动展开大辩论，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始于1844年《黄埔条约》的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1860）之后，由于法国在中国采取了帝国主义政策，由于圆明园的大劫难被雨果揭发^⑤，这样的辩论随之愈演愈

① 关于这个，要注意的是，《百科全书》包含“中国”词条，顺带提到“中国哲学”；这一词条由狄德罗本人撰写，出现在1772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单独一卷中，附在《论美》之后。狄德罗对中国的迷恋自然不能与伏尔泰相比，后者不仅在《风俗论》中盛赞中国人，而且将马若瑟神父译自中文、杜哈尔德神父出版的戏剧《中国孤儿》重新创作并搬上舞台。尽管狄德罗在“中国”词条中批评了儒家学说，将之比作某一宗教派别，但是他赞赏孔子，就像塔克斯·柯泽吉在发表于1994年第XVI卷《狄德罗与〈百科全书〉研究》第125—131页的文章《狄德罗与儒教：基于“中国”（中国哲学）词条中“儒教”一词的研究》所阐述的那样。

②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远东这一概念（东亚所有国家）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根据《法语的宝库》记载，1877年，龚古尔兄弟在《日记》中明确提到远东一词，见缪里尔·德特里与让-马克·木拉：《对远东的思考与呈现》，导言，《比较文学杂志》，第297期，克林西克出版社，第5页。

③ 巴尔扎克：《中国与中国人》，《巴尔扎克通讯》，第21—22期，2012年，第7页。

④ 同上书，第12页。

⑤ 巴特勒上尉询问维克多·雨果对于英法两国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何看法，作家选择了以信件的

烈。

小说家的热情是另一个叫人吃惊的地方：巴尔扎克所谓的“好人”博尔热在画册当中表现得彬彬有礼，与巴尔扎克形成鲜明对比。博尔热的画册包含 32 幅石版画，是根据实物草图制成的，其中没有任何颠覆性的东西，“鸦片”一词甚至没有出现于图画旁边的只言片语中！为了确定中国到底有何魅力，能让作家如此投入，我们的方法就是将这一系列文章与他的作品全集加以对照，统计他在 1842 年前后提及中国的频率，考察博尔热的旅行是否改变了巴尔扎克之前对天朝的看法。

能指“中国”在 1842 年以前《人间喜剧》当中的内涵

根据锥生先生所作的词句索引^①，中国在《人间喜剧》中一共出现 83 次，由此可见，巴尔扎克并非只在他为博尔热的画册所写的书评中提到中国。尽管在 1842 年巴尔扎克为画册所作书评《中国与中国人》发表前后，“中国”这个词的意义包含某些不变的成分，但是通过分析该词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能指“中国”首先指“别处”（l'ailleurs），就像皮埃尔·希特隆在他的文章《巴尔扎克的亚洲梦》中所陈述的那样：

形式在报纸上公开答复。在这封信中，雨果揭发英法两国对清朝皇帝避暑行宫的洗劫。这座行宫，作家虽然没有亲眼见到过，但是他称它为“世界奇迹”。雨果指出，人们想象中的野蛮并非真正的野蛮。雨果称英法两国为“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焚毁”，他还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干下的勾当。”诺拉·王、叶新（音译）、王璐（音译）：《维克多·雨果与圆明园大劫难》，印度东方学/友丰出版社，2003 年，第 10 页。

① 日本埼玉大学教授和夫·锥生先生将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都数字化，包括《人间喜剧》、《通信集》（卡尼尔出版社）、《致韩斯卡夫人的信》（罗贝尔·拉封出版社）、《早期小说》（罗贝尔·拉封出版社）、《都兰趣话》（七星文库）、《杂集》（七星文库）、《戏剧》（珍本收藏家），以便建成词句索引目录，也就是按照字母顺序将词汇重新排列。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工具，读者可以上巴尔扎克之家的网站查询。

“亚洲、东方……巴尔扎克赋予这些词语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透过下文大量引用的巴尔扎克作品看清楚。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说，在他头脑中，这两个词的绝大部分意义互相重叠。两者加起来就包括远东和近东，远东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近东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我们将会看到，亚洲有时候延伸到俄罗斯；东方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里不仅包括以色列（以及所有犹太人）和埃及，而且包括北非甚至西班牙、摩尔地区……雨果也将一些西班牙文诗歌收录在《东方集》中。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印度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认为，巴尔扎克即使知道亚洲和东方的差别，好像也并不以为然，这也是 L.F. 霍夫曼在他的著作《〈人间喜剧〉的地理学》中的观点。”^①

因此中国构成巴尔扎克东方想象的一部分，其边界虽然并不十分明确，但是肯定非常遥远。这样的意义在一个词组中表露无遗，那就是“在中国杀死一个满大人”，奇怪的是“中国”这一地点名词前面使用了介词à。在《高老头》拉斯蒂涅克和比安西奥蒂的对话中，巴尔扎克运用了这个词组。拉斯蒂涅克渴望一夜暴富，他偶遇朋友比安西奥蒂，坦承了他良心不安的缘由：

——你读过卢梭吗？

——读过。

——你记不记得这样一个段落，卢梭问读者，如果不离开巴黎，仅凭意念就可以杀死在中国的一个年迈的满大人，并因此发财致富，他会怎么做呢？^②

尽管这里明确指向满大人，而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满大人这一

① 皮埃尔·希特隆：《巴尔扎克的亚洲梦》，《巴尔扎克之年》，1968年，第306页。

② 巴尔扎克：《高老头》，七星文库，皮埃尔-乔治·卡斯特克斯主编，伽利玛出版社，1976年，第III卷，第164页。所有《人间喜剧》的引文皆出自这个版本。

头衔在巴尔扎克的想象中很有分量，但是“tuer à la Chine”中，介词à并非表示杀人的方式，而是指极其遥远的距离，指远在天边的事物，人们轻易不能逢遇的事物。中国由此与巴布亚省和新荷兰一道成为某种范式，就像巴尔扎克青年时代的小说《阿涅特与罪犯》所呈现的新荷兰那样。

“在那里，在新荷兰，你如果仅凭眼神就可以杀死一位行将就木的人儿，而且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你期盼着通过这半个罪行大发横财；当你住上自己的豪华公寓，坐上自己的豪华大马车，你就会说：我的马儿，我的土地，我的威望！你绝对会毫不犹豫地重复：像我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儿！”^①

在1829年的短篇小说《苏镇舞会》中，中国依然意味着遥远的距离：“有一阵子，两个人相距甚远，好像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格兰兰。”^②1841年在报纸上连载的《于絮尔·弥罗埃》也一样。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宣称，弥罗埃医生诊断的梦游者能够说出在距离他诊所“二十古里远”的地方以及“在中国”^③（en Chine）发生的事情。虽然在1830年代的文章与《于絮尔·弥罗埃》中，“中国”一词的内涵是一样的，我们却注意到，在《于絮尔·弥罗埃》中，介词“à”被“en”所取代，而“à”在18世纪非常常用^④，到了19世纪，夏多布里昂依然在使用^⑤。根据介词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测，法国人对中

① 巴尔扎克：《阿涅特与罪犯》，见《早期小说》（拉封出版社），旧书文丛，1999年，第Ⅱ卷（1822—1825），第539页。

② 巴尔扎克：《苏镇舞会》，第Ⅰ卷，第157页。

③ 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第Ⅲ卷，第828页。

④ 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第七册第六章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标题“论中国（à la Chine）的奢侈享受”，其后便是“中国奢侈享受的不良后果”。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一样使用介词à，《哲学词典》中的词条“论中国”开头便是：“我们将要到中国寻找土地，就好像我们没有土地似的。”卡尼尔-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64年，第111页。

⑤ 萝丝·福尔塔西埃为我们参阅的七星文库版本的《高老头》作注，她引用的夏多布里昂的一段话可能是巴尔扎克为拉斯蒂涅克设计的那段话的来源：“如果仅凭一个欲望，你就能杀死在中国的一个人，然后在欧洲继承他的财产，并且坚信别人对此一无所知，那么您会愿意产生这样的欲望吗？”《基督教的真谛》，I，VI，2，萝丝·福尔塔西埃引用，《人间喜剧》第Ⅲ卷，

国的认识向前进了一步，中国好像不那么陌生，不那么封闭，已经有点半开放了。然而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这个国家依然意味着别处。

但是在1842年以前，“中国”这个词只是意味着位于地球上另一个半球某个地方的一片广阔疆域。由于中国工艺品在19世纪法国盛行多时，中国一词便具有精致（*raffinement*）的含义，而且首先指精致的装饰。在《人间喜剧》中，室内装饰但凡跟奢华沾点边，也都跟中国风脱不了干系。在《禁治产》中，由于丈夫偏执地热爱中国，女主角爱斯帕尔侯爵夫人想要剥夺他处理财产的权利，但是她本人的沙龙也充满了中国风，明察秋毫的大法官波比诺向她指出了这一点。他指着壁炉的装饰品说：“尽管爱斯帕尔侯爵疯狂痴迷中国，但是我乐意看到你同样喜欢这些东西。或许你拥有的这些迷人的中国玩意儿，正是得自爱斯帕尔侯爵。”他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精致的玩意儿^①。各种物品如布料、窗帘、披肩等（“卡米耶·莫班胸前披着一块中国的红色丝绸小披肩^②”），各种器具如瓷器、漆器也都尽显中国工艺品的精致，比如《三十岁的女人^③》中艾莲娜客厅里的生漆桌子，尽管她生活在船上，她的小客厅聚集了所有代表奢华的物品。亚洲式的精致是19世纪所追求的，也出现在1842年以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这种精致一直渗透到女性时装中，比如《家庭和睦》中那个高雅的不知名的女人所佩戴的中国头饰。进入19世纪，法国人对天朝的迷恋并没有中断，1842年末博尔热发表他的图册《中国与中国人》的时候，同时有两部有关中国的带插图的著作出版^④。

第1280页。

- ① 巴尔扎克：《禁治产》，第Ⅲ卷，第466页。
- ② 巴尔扎克：《贝阿特丽丝》，第Ⅱ卷，第807页。
- ③ 巴尔扎克：《三十岁的女人》，第Ⅱ卷，第1190页。
- ④ 《巴尔扎克通讯》用一期的篇幅专门研究《中国与中国人》，艾尔维·庸撰写了卷首出版说明，提供了几乎与博尔热的著作同时出版的这两本带插图的著作的标题，一是《中国帝国：从远古时代到今天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建筑、工艺详史》，英国钢版画，原画画家Th.阿罗姆是《古代与现代的君士坦丁堡》的插图画家。该书第一册于12月15日出版（《书店日报连载》，第47期，1842年11月19日）；二是《中国：风俗、习俗，附最优秀的艺术家的石版画，精心上色》。

中国经常出现在 1842 年以前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在 1836 年，小说家将一个中国迷塑造为其中一部小说的主人公，由此创造了此前法国小说图景中未曾存在过的人物。虽然书店里一直都售卖有关中国的书，但更多的是在游记以及图册栏中。爱斯帕尔侯爵出版了《如诗如画中国史》，这一人物的塑造在那个时代的小说界乃至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只是个例。爱斯帕尔侯爵夫人这一人物在《人间喜剧》中反复出现，也是最经常出现的人物，因为她的沙龙经常有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光顾；爱斯帕尔侯爵与之不同，其形象因为他的缺席而熠熠发光：他单独抚养两个儿子，想要洗刷抹黑了祖先姓氏的污点，因为从商而丧失贵族身份。这个人物如此独特，以至于他好像注定要待在社会边缘，也即《人间喜剧》这个世界的边缘。但是将这个道德高尚的、最高品级的贵族塑造成一个中国迷，说明自 1836 年起，巴尔扎克不仅对中国大为赞赏，而且渴望提前在这片土地上打下自己的烙印。爱斯帕尔侯爵出生于 1836 年，这或许不是一个偶然。

1836 年与 1842 年相呼应，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奥古斯特·博尔热出发去周游世界，一直走到中国。在 1836 年，巴尔扎克把他那位中国迷主人公取名为爱斯帕尔，这个词在法文中的发音与“出发”一词大致相同，我们不禁想道，巴尔扎克是不是希望借由写作，比博尔热更早一步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此外，也是在 1836 年，巴尔扎克经常与戈蒂耶往来，并且将后者纳入他在《巴黎编年史》的撰稿人团队中。1836 年，戈蒂耶刚刚写了一首诗《中国工艺品》，其中第二个四行诗节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美：

我心爱的人儿此刻在中国
陪伴着年迈的父母
住在细瓷塔楼中

第二本书的广告语如下：“这部漂亮的书可以作为新年礼物馈赠亲友。”艾尔维·庸以下这些话作为出版说明的结语：“中国在那时候非常时髦！”《巴尔扎克通讯》，见前引书，第 6 页。

在那鱼鹰出没的黄河畔。^①

这是真正的诗歌宣言。这首诗将古典诗歌中的劳尔和贝阿特丽丝替换下来，以便前往中国寻找、更新有关美人与美的想象。

因此巴尔扎克不是要等到为一部以中国和中国人为题材的图册写书评的时候才在文学上关注中国这片土地。巴尔扎克与戈蒂耶交往，得到后者的大力宣扬，并对文学革新感兴趣，自己也在小说领域中推进这种革新。但是，1842年以后，这种对中国的牵挂将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且更多地表现出他对这个国家的个人情结，这样的情结在《禁治产》中已经初现端倪。

中国以及 1842 年以后巴尔扎克对中国的想象

如果说在 1842 年前后附着于“中国”这个词语的内涵中存在一些不变的东西，比如精致、奢华，那么，还有一个新的意义附着在这个词语上，那就是财富（fortune）。

在博尔热长途旅行之前，《人间喜剧》中人物追逐财富的黄金国是印度。这就是《欧也妮·葛朗台》中夏尔·葛朗台以及《婚约》结尾保尔·德·马涅尔威尔前去的的地方。《创造者》中所谓的百万富翁戈多也是来自加尔各答，后来他替梅尔加代偿还了所有债务。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与戏剧中，印度与在遥远的海外、香料之路上取得财富的形象相连。但是，1842 年以后，印度即使不是被另一个国家即中国所取代^②，也已经受到这个国家的挑战。莫戴斯特·米尼翁的父亲就是

① 泰奥菲尔·戈蒂耶：《诗歌全集》，夏尔庞蒂埃，巴黎，1877 年，第 I 卷，第 329 页。根据克洛德-玛丽·森宁格爾的研究，这首诗写于《莫班小姐》出版期间；1835 年底，泰奥菲尔·戈蒂耶创作于德延耐大街。《泰奥菲尔·戈蒂耶，他的一生及其作品》，塞德斯出版社，1994 年，第 86 页。

② 实际上，在《交际花盛衰记》中，佩拉德是“有着令人觊觎的遗产，据说他在印度挣得百万家产”，因此他的侄孙开始调查这位“神奇的叔公”，《交际花盛衰记》，第 VI 卷，第 541 页。这部小说与《创造者》的相互呼应显而易见，我们不禁思考，巴尔扎克是不是有意制造互文参照。

去了那里才重振自己的财务地位，他正是在广州做鸦片生意才赢得了百万家产，重新买回自己的土地。我们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说在巴尔扎克撰写小说的时候，鸦片问题与同名战争（即鸦片战争）一样是时事热点。作为他所生活的社会里的历史学家，巴尔扎克让这份快速得来的财富显得很逼真。然而，我们可以设想，莫戴斯特的父亲在故事中所做的，也正是巴尔扎克所梦想的。实际上，博尔热返回法国以后，写信给小说家：

亲爱的，您知道吗，我曾经眼睁睁看着财富与我擦肩而过。要是没有鸦片走私，就不会有战争，那么我就能带着三万、四万甚至五万法郎的身家离开澳门了。在英属印度，在我几乎要重新获得这笔财富的时候，我突然病倒了，医生要我离开这个国家（……）而您呢，奥诺雷，财富有没有降临到若尔迪？^①

知道巴尔扎克在何种程度上将他的所有见闻酿造成文学之蜜，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勒阿弗尔的贵族如何通过鸦片贸易变成巨富。博尔热的旅行确实滋养了作家的想象，这位旅行家兼艺术家跟他讲述的事情变成他文学创作的材料。

在某种程度上，巴尔扎克与奥古斯特·博尔热之间的关系和十年前他与格朗-贝藏松一样。1831年12月，在昂古莱姆他的朋友伽罗家里，小说家听面粉专员格朗-贝藏松讲述了他的爪哇之行，据此写成《从巴黎到爪哇的旅行》，1832年发表在《巴黎杂志》上。巴尔扎克将这次想象中的旅行讲得好像亲身经历似的，有趣的是，这个游记的撰写其实得益于博尔热的帮助。未来的《中国与中国人》作者在那个时期充当了作家的秘书，他担负着为即将发表的文章审核文献的任务。在

^① 巴尔扎克：《通信集》，卡尼尔兄弟出版社，1966年，作品由罗歇·皮埃罗收集、分类、作注，第IV卷，第166—167页，1840年10月10日写的信。由于伽利玛出版社没有出版巴尔扎克通信全集，1841年以后的信件我们参考卡尼尔兄弟出版社的版本。

一封写给他们的共同朋友祖尔玛·伽罗的信中，巴尔扎克如此写道：“奥古斯特告诉我，这些有关爪哇的资料都是假的，这也是我之前所担心的。”^①因此奥古斯特·博尔热将巴尔扎克与亚洲的爪哇岛和中国连接起来，充当了巴尔扎克与亚洲的双重联系人。热衷于享乐的印度尼西亚刺激了作家的想象，让他写出充满肉感的篇章，以至于杂志的负责人不得不删掉其中几个句子^②，而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不同，这个千年文明古国被描写成一个心灵手巧的国家。在中国的伟大发明中，有一个是作家大力阐述的，即纸张的发明。

如果我们回头再看中国一词在《人间喜剧》中的出现频率，可以看出这个词主要是出现在三个文本中：一是1836年的《禁治产》，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部简短的小说将一个中国迷搬上舞台，而这个中国迷出版了《如诗如画中国史》；二是1844年的《莫戴斯特·米尼翁》，主人公从广州回来以后成为百万富翁；三是《幻灭》。“这部著作中的巨著”^③的创作分成若干次完成。小说的三个部分分别在1837年、1839年和1843年发表。就像若泽-路易斯·迪亚兹指出的

① 巴尔扎克：《通信集》，第I卷，七星文库，2006年，第682页。

② 出于“装模作样”——《巴黎杂志》的负责人阿梅德·毕肖在写信向巴尔扎克解释的时候自己使用了上述字眼——的需要，阿梅德·毕肖删除了巴尔扎克描写爪哇女人搔首弄姿的三个长句。以下是被删除的那段话：“在那里，雌性动物的天性比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那里的女人拥有与生俱来的柔软。她们能做出最优雅的爬行动物才能做出的环形动作；她的身体合拢，再次合拢，蜷缩着，搓成一团，舒展着，像藤或者旋花那样灵活地向上攀升。她使尽化学激情攫住爱情，促使两个物体相互撕扯，其中一个让另一个颜色尽失、精疲力尽。爪哇女人的身体似乎生来灵敏。她扭动身体，速度令人赞叹，让人想起横卧草丛的野兽被人惊扰迅速起身、离开的样子。这些雌性动物喷涌着，发出噼里啪啦的轻响，继而爆出巨响。然后，就像平静的大海映照出天空，她们玫瑰般的脸庞显示出她们的幸福，激情万丈的眼睛闪过一丝疲惫。”《从巴黎到爪哇的旅行》，导言，前面引用的书，第11—12页。爪哇这个名字在巴尔扎克脑海里引发的联想与中国带给他的灵感真是天差地别啊！

③ 巴尔扎克在1843年3月2日写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透露了这个用以形容《幻灭》的这个词组的来源。在评论《人间喜剧》的出版时，他这样写道：“第三卷——其中包括《幻灭》，这部小说的结尾还没有写完——耗费了我三个月的辛劳。但是就像贝尔焦索郡主所说的，这一卷真是鸿篇巨制！这是著作中的巨著！”《致韩斯卡夫人的信》，前面引用的书，第I卷，第650页。

那样，为了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联结起来，为了将大卫·塞查尔德塑造成发明家，1843年巴尔扎克添加了一篇谈论纸张历史与制造的小论文^①。《幻灭》中“中国”一词出现了13次，其中10次出自这篇小论文。

中国纸是大卫·塞查尔德想办法仿造的样品，为此他努力寻找其配方。作家偏离主题，大谈纸张的历史与制造。作家的声音慢慢地浮现了，提到两个校阅员就中国人造纸所使用的配方打赌。最终是格鲁贤神父给出了答案：他告诉两位校阅员，在中国，纸是用竹子造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让他们看了杜哈尔德神父四卷本著作中其中一卷的版画。

格鲁贤神父（1743—1823）是博学的编纂者，于1787年发表了《中华帝国全志》，其中有一章专论造纸与印刷，转引自杜哈尔德的著作。1843年，巴尔扎克在《幻灭》中让格鲁贤神父出场，在一场有关造纸的赌局中作为双方的仲裁者出现。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引用格鲁贤神父，让人相信他写在书评里的话是真实的。巴尔扎克在自传中提到，他自童年起“颇受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熏染，因为有一个至亲热爱中国这个奇怪的民族”。他婉转提到的至亲就是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即作家自己的父亲。在这句话后面他还写道：“因此，从十五岁开始，我就阅读了杜哈尔德神父、格鲁贤神父的著作，后者在夏尔·诺蒂耶之前担任兵器图书馆的馆长。此外，有关中国的或真或假的叙述我大多有所涉猎”^②。格鲁贤神父将小说作品和新闻报道联结起来：一方面，他为小说文本提供了科学保证，另一方面，他提及巴尔扎克的父亲的藏书，从而引进自传的成分，让新闻写作从无人称叙述的框架中挣脱

① 当巴尔扎克决定将大卫塑造成发明家——大卫像巴尔萨那样被激情吞噬，遂放弃经营印刷厂转向研究——的时候，他还必须再做一些更加务实的准备工作，其中就包括“有关纸张历史与制造的小论文”（第126—131页），在菲尔涅版的修改本中，他将这篇小论文从第三部分挪到第一部分，以便让三部曲的首尾两部更加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若泽-路易斯·迪亚兹评论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幻灭〉》，简装文库，第34页。

② 巴尔扎克：《中国与中国人》，前引书，第7页。

出来，动摇了新闻写作的规则。

但是巴尔扎克对这位著名的耶稣会士的引用并没有停留在上述这两个地方，格鲁贤神父还出现在小说《禁治产》中。这回是爱斯帕尔侯爵在说话。法官波比诺负责调查以便确定侯爵是否发疯，有没有必要对他进行禁治产，侯爵如此回答波比诺的提问：

“我的家庭教师是格鲁贤神父，在我的推荐之下，查理十世任命他为兵器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格鲁贤神父熟悉中国及其风俗习惯；他将我培养成他的继承人，在那样一个年龄，人们不可能不疯狂热爱所学的东西。二十五岁的时候我掌握了中文。我承认我对中国情有独钟，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征服了她的征服者，其历史无疑可以追溯到一个远比神话或者圣经时代更加遥远的年代；这个民族通过其亘古不变的体制捍卫了领土的完整性，其建筑恢弘壮阔，其行政管理臻于完善，有效抑制了革命的爆发；这个民族将理想的美视为一个自足的艺术原则，其奢侈享受与工艺制造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无论如何超越不了，而在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地方，她往往能够与我们并驾齐驱。”^①

爱斯帕尔侯爵的论据与巴尔扎克在书评中为了颂扬中国、诋毁七月王朝治下法国的现状而提出的论据惊人地相似。除了这篇文章的溢美之词，《人间喜剧》多次提到孔子：在这里，孔子与摩西一样被视为“人类最伟大的立法者”^②。小说家跟侯爵一样是个中国迷，同样赞赏中国的奢侈享受与工艺制造。他在第三篇文章的开头专讲中国艺术，有必要引用一下。巴尔扎克赞赏这种“丰富到无以复加”^③的艺术，因为它不属于在有关理想的经典中故步自封的古典美学，而是源于怪诞，是幻想和融合的产物。由此一种关联得以建立，从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萨出发，途经爱斯帕尔侯爵，直抵巴尔扎克，

① 巴尔扎克：《禁治产》，第Ⅲ卷，第487页。

② 巴尔扎克：《乡村教士》，第Ⅸ卷，第825页。

③ 巴尔扎克：《中国与中国人》，前引书，第28页。

格鲁贤神父则贯穿始终。

在巴尔扎克的想象中，父权与文字是中国的标志，从而使中国有别于模糊的大杂烩即东方。东方能够唤起多少形象、多少陈腔滥调，1842年以后的中国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巴尔扎克演绎为文字的文明。巴尔扎克的书评证明了这一点，他的第一篇专栏文章专论中国铭文：“旅行者到中国，让他印象深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不计其数的铭文：在城墙上，在岩石上，在家里的门槛上，在门楣上，在百叶窗上，在屏风上，在门帘窗帘上，处处可见中国人铭刻的宗教箴言及法规。”^①

因此，博尔热从中国旅行归来后，巴尔扎克作品中展现的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虽然增加了某些新的元素，但也保留了一些不变的东西。相反，发生变化的，是小说家与中国的关系：他将中国拉到自己身边，将它带到文字、文本、纸张中，换句话说，带到他的领域中。

中国，满大人比尔博盖的领域

虽然博尔热通过某些方面将巴尔扎克与亚洲联结起来，然而在激发作家对中国的热爱时，他所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如作家的父亲。多亏了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的藏书清单，我们知道作家的父亲拥有不少于25册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就包括杜哈尔德的《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或者中华帝国编年史》以及格鲁贤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的著作启发了启蒙运动哲学家们对中国的热爱，也为巴尔扎克的父亲提供了有关中国的知识。除了引用他们的著作，在书评中向他们致敬则是更好的做法^②，作家由此成为他们的继承人。基于“père”

① 巴尔扎克：《中国与中国人》，前引书，第14页。

② 巴尔扎克在第一篇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一个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殉道，最后一篇文章以一个注释结尾；他在注释中提到前面所说传教士神父的名字：“注意：那位遭受了磨难的可敬的神父名叫贝尔伯瓦尔。至少他所做出的牺牲要广而告之！”通过这样的首尾呼应，小说家强调了传教士为法国人了解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尽管他承认传教士的著作可能有不实的成分，但是他跟随父

（父亲，神父）一词的双关含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双重继承关系，因为传教士神父激发了他的父亲对中国的热爱。

据说，这个小男孩阅读了父亲所拥有的耶稣会士的著作，那么他真的就像在书评中所宣称的那样，与贝尔纳-弗朗索瓦讨论过中国人民的天性吗？我们不知道。不过，小说家提及每当他与父亲观点不一致的时候，“这个人儿总是勃然大怒”，而对于这个人儿，“根据中国法律，这个人几乎是神圣的、神明一般的存在，他应该满怀崇高的敬意”^①，在此，他具体提到孔子有关孝道的教导，这样的教导让他难以忘怀。

中国人对父亲的敬重是小说家崇敬的礼仪，除了在书评，他还在《人间喜剧》中加以引用。在《搅水女人》中，克拉巴龙老爹死后，比克修如此评论：“克拉巴龙老爹死了，明天下葬，他的儿子是银行家，坐拥金山银山，却只预订最低等级的车队。这个儿子缺乏教养。在中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②然而，查阅七星文库该小说各个版本的文稿，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出现在小说原稿中。手稿里是这样写的：“他的儿子是银行家，坐拥金山银山，却置他于贫困而不顾。这个人真没教养，他忘记了要尊敬父母亲的教导。”^③巴尔扎克用孔子的礼仪代替了圣经的教导。这个版本的文稿可能令人惊讶，除非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搅水女人》这部小说发生在博尔热的家乡伊苏丹，该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画家，引用的那个段落发表在1841年2月28日的《新闻杂志》中，在那个时期，巴尔扎克再次见到这个从中国回来的贝里人。1841年2月2日，巴尔扎克特地邀请博尔热到家里：“我亲爱的博尔热，今天是2月2日星期二，来跟我一起吃晚饭吧。我需要跟您谈谈，此外，

亲继承了他们的精神遗产。因此，通过这样一个结尾，巴尔扎克要“广而告之”的其实是通往中国的传教士的著作，而不是博尔热的图册。

① 巴尔扎克：《中国与中国人》，前引书，第7页。

② 巴尔扎克：《搅水女人》，第IV卷，第316页。

③ 热内·吉斯：《注释与多个版本的文稿》，《搅水女人》，第IV卷，第1239页。

我已经很久没有沾染您的气息了（……）”^①

博尔热的影子笼罩在《搅水女人》上，我们不禁思考，对敬重父亲这一中国礼仪再三强调，或许只是一个手段而已，目的是为了提醒贝里画家必须敬重巴尔扎克这个象征性的父亲。1832年，巴尔扎克在卡西尼大街接待了博尔热并且将他带进文艺圈。1833年9月，他们俩一起赴瑞士旅行，巴尔扎克向韩斯卡夫人介绍了博尔热，后者颇得夫人的欢心。作家百分百信任博尔热，委托博尔热在他死后将乌克兰伯爵夫人的信件悉数焚毁。但是，1836年，这位贝里画家决定远游海外，这次不再是教育性的壮游，而是环球旅行。小说家反对这次旅行，因为他看不到其中有何艺术价值。然而奥古斯特·博尔热没有遵从这一指令。尽管他们两人没有就此断绝关系，但是要注意的是，博尔热从中国回来以后，巴尔扎克对他的赞赏从此消失殆尽。1833年，他向韩斯卡夫人吹嘘他这位被保护人的艺术才华：“这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这是一颗更为高贵的心，充满毅力的年轻人，纯洁得犹如纯情少女。他不想在今年展示他那了不起的研究，他宁愿再学习两年才公之于众。我赞扬他的这份决心。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伟人。”^②但是在1841年3月，他向同一个通信者宣称：“我们那位旅行家博尔热孜孜以求他的荣耀，努力描绘他的风景画；但是我担心他没什么天赋；我国人才济济，再多一个也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③，1842年4月，他又如此写道：“博尔热从中国回来了，他画了些恶心的中国画，被路易-菲利普收购了。”^④

因此，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篇书评可视为一次清算。我们不禁思忖，巴尔扎克所提到的父以子贵是不是又是一种方式，提醒博尔热作为精神之子的身份。在他的画册中，这位贝里的画家绝口不提这种事，但是巴尔扎克则做了如下标注：“在中国，我们的观察家注意到一个完

① 巴尔扎克：《通信集》，第Ⅱ卷，七星文库，第863页。

② 巴尔扎克：《致韩斯卡夫人的信》，第Ⅱ卷，拉封出版社，“旧书文丛”，1990年，第39页。1833年5月29日写的信。

③ 同上书，第526页。

④ 同上书，第570页。

美运行的机制，这个机制仅凭自身便能拯救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就是父以子贵。您名扬天下，但是荣耀归于您的父亲。”^①这难道不是说，根据中国律法，博尔热的荣耀泽及父亲，从而将这位图尔的作家提升到文人满大人的地位？这又何尝不是作家本人的所作所为呢，从第一篇文章开始，作家就向他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萨致以敬意。

由于他的童年、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在作品中对中国的呈现，与博尔热相比，巴尔扎克对中国这片领域拥有更多的权利；而博尔热“并没怎么去过中国”^②，巴尔扎克别有用心如此写道。他之所以补充这一信息，是为了提醒大家，外国人在广东不得逾越其在华办事处。因此，尽管巴尔扎克在作品中真正提到中国的只有寥寥数页，但是这个国家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她参与打造了巴尔扎克的精神谱系。根据巴尔扎克的妹妹的描述，他们的父亲阅读“最早描绘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巨著”^③，巴尔扎克和他父亲一样发现了杜哈尔德神父以及格鲁贤神父，他的父亲与中国做过贸易，巴尔扎克也梦想和他父亲一样做个商人。然而，在巴尔扎克看来，有一个领域可以获得巨额利润，那就是中国。

1838年5月，在听一个批发商说起撒丁岛的银矿以后，他奔赴那里想要开矿。然而比起撒丁岛，中国更能激发他飞黄腾达的梦想。在他与韩斯卡夫人的通信中，有一个症候式的词语反复出现了四次，那就是“到中国东征西讨”。1838年11月，在他独自前往撒丁岛却无获而归之后，当他说起他那些离奇的商业计划时，他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时提到中国和撒丁岛，而在其他三个地方，只有中国被提及。1834年，巴尔扎克声誉日隆，对自己的天赋以及永不枯竭的想象力信心满满，他写信给韩斯卡夫人：

① 巴尔扎克：《中国与中国人》，《巴尔扎克通讯》，前引书，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劳尔·苏尔维：《从通信集看巴尔扎克的人生与创作》，拉玛坦出版社，珍本文丛，2005年，新书店出版社，1858年，第41页。

“好吧，我想要您听到我的名字被人大张旗鼓、毕恭毕敬地说出来。我想要给予您最温柔的友谊的快乐，我想要您跟自己说：他在日内瓦笑得像个孩子，而到中国则是东征西讨！”^①

1837年10月，在提及最近刚刚寄给印刷厂的滑稽故事时，为了描绘韩思基伯爵阅读这些故事的乐趣，他再次使用这个词语，并且做了如下标注：“维尔卓尼亚老爷将会开心大笑，就好像我在中国东征西讨的时候那样。”^②最后，1840年，巴尔扎克身心俱疲，韩斯卡夫人的沉默折磨着他，他对后者坦承：“一种内在的衰老攫住了我，使我惊恐万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到中国东征西讨，在日内瓦，这曾经让韩思基先生开心不已。”^③

因此，“到中国东征西讨”这一词组等同于童年、欢笑、梦想——名利双收的梦想——这一概念，同时带有一种介于严肃与幻想之间的张力，就像中国本身在他想象中那样。的确，他的父亲与中国从事贸易，而作为儿子的他，只是“到中国东征西讨”；然而父亲只不过发表了一些薄薄的小册子，他却创建了一座大教堂。

因此，中国的确影响了巴尔扎克，这种影响只能在作家的过去中寻找。中国还是作家的投影，或者不如说，这个国家能够正确评估作家的价值，而法国媒体总是对他大加鞭挞，法兰西学士院给他吃了闭门羹。在中国，一个人必须凭借才华才能脱颖而出，而不是仰赖家庭出身，抑或更糟糕的依靠金钱；在中国，贵族不是世袭的，社会精英从文人之中选取。对于梦想成为文学界的拿破仑的作家而言，中国拥有一个更高级的体系，《人间喜剧》的作者非常喜欢，因为他极力赞扬中国的体制。民主不是巴尔扎克为之战斗的事业。相反地，在中国和俄国实行的强权、专制、独裁让他着迷。1847年10月，他在他唯一一部真实游记《有关基辅的一封信》中如是写道：

① 《致韩斯卡夫人的信》，第I卷，第210页。

② 同上书，第413页。

③ 同上书，第500页。

“我不是虚伪之人，很久以前我就表达了对绝对权力的赞赏，当然我是有所保留的：世界上没有绝对权力。我说的话并没有互相矛盾。比起由一群人统治的政府，我更喜欢独夫统治的政府，因为我觉得我无法与民众共处，也无法取悦他们，任何人要是尝试这么做，都无法感觉良好；然而我认为自己可以跟一个人相处，即使是最大的独裁者之一，当然我也许过于自信了。”^①

这篇文章堪称“为专制所做的最好的辩护书”^②，它将俄国与中国相提并论，不仅因为她们都是强权国家，还因为她们都拥有辽阔的疆域，都距离欧洲非常遥远。然而，在这篇游记中，巴尔扎克是真实的旅行者。他讲述了自己到达波兰，与住同一家旅店的一个来自钮查特的瑞士人的谈话：

“啊，就这样，您要这样去俄国？啊！您不知道您在干什么！……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您就已经不是在欧洲了；您现在在中国；中国的边界在拉德兹维乐弗。您懂波兰语吗？”

——不懂。

——您懂俄语吗？

——不懂。

——您一个人吗？

——一个人。”^③

《有关基辅的一封信》没有发表，但是巴尔扎克一个人完成了一次长途旅行，这次旅行以某种方式将他带到中国。到达维尔卓尼亚，

① 巴尔扎克：《有关基辅的一封信》，《巴尔扎克通讯》第7期，日内瓦：斯拉特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② 罗歇·皮埃罗：《奥诺雷·巴尔扎克》，法亚尔出版社，1994年，第463页。

③ 巴尔扎克：《有关基辅的一封信》，前引书，第49页。

他发现了韩斯卡夫人的城堡，他称之为小“卢浮宫”。他再次见到了他心爱的伯爵夫人，见识了附庸在伯爵夫人领地里的 1000 个农奴以及她的 300 个仆人。也正是在这个城堡小住之后，他变本加厉地购买中国艺术品。如果我们再来看“中国”一词的出现频率，这次是出现在 1809 年至 1850 年的信件中，可以找到 18 次，其中 7 次出现在他从维尔卓尼亚归来以后，而且大部分与中国艺术品相关。

对旧货、古董——所谓真正的古董——的热爱伴随他的一生，到最后，在他与俄国伯爵夫人的婚事成为可能以后，这种热爱愈加强烈。1845 年，巴尔扎克与伯爵夫人及其女儿、未来的女婿乔治·姆尼舍克一起游遍欧洲。这个小团体组成一个四重奏，为了纪念 1838 年杂耍剧院的滑稽表演——1843 年在圣彼得堡再次表演，他们将小团体取名为江湖杂耍者。巴尔扎克是比尔博盖，韩斯卡夫人是阿达拉，乔治是格兰加莱，安娜则是年轻的女一号泽菲琳娜。江湖杂耍者的话题在他们的通信中屡屡出现，说明这个小团体的成员相互默契十足。巴尔扎克作为比尔博盖，担任象征性父亲的角色，因为他是领头人。巴尔扎克利用旅行购买珍稀的物品，特别是自从他在吉祥街购买一处公馆，为自己与未来的妻子筑巢以后。

有人持有这个处所的物品清单。这份清单预订于 1848 年，部分由巴尔扎克本人书写，展示了作家所拥有的数量惊人的中国艺术品：器皿、花瓶、游戏盒、数套茶具，其中一套包含 164 件器具，三个瓷茶壶以及无数件中国锦缎覆盖着的家具。巴尔扎克就像他最后的小说之一《邦斯舅舅》的主人公一样，是个收藏家。

我们可以指出，这些物品是为了装饰吉祥街公馆，为了在那里体面地、极尽奢华地安置维尔卓尼亚的领主夫人，但是，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愿望，他愈发热爱奢华，甚至变得狂妄自大，而这与他购买中国艺术品脱不了干系。1850 年 3 月 17 日，他向他的朋友纳夸特医生宣布他于 3 月 14 日在别尔迪切夫举行了婚礼。他特别指出，通过与韩斯卡夫人联姻，他成为“玛丽·莱克辛斯卡侄孙女”的丈夫，“沙

皇副官的姐夫”，“沃尔洛夫伯爵的丈人”。他又补充道：“小报纸将会说，我像中国皇帝一样成为太阳的表兄，月亮的女婿”^①。他吹的牛皮简直无以复加。1847年3月，乔治和安娜·姆尼舍克寄来一封信，年轻夫妇提到吉祥街公馆的装饰，宣布“著名的文人满大人比尔博盖的宫殿是美化伟大首都的最美丽的杰作之一”^②。

巴尔扎克期望从精神之子博尔热那里得到的荣誉，终于从另一个儿子，即未来的女婿那里得到了。通过以上那些话，乔治·姆尼舍克伯爵不知不觉击中了他的心坎。作家正是通过他的继承关系、他受到的教育以及他在文学和金钱上的投入，为自己创造了文人满大人的中国宫殿。

因此，尽管巴尔扎克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投入的笔墨有限，但是这个国家在巴尔扎克的作品、想象和生活中很有分量。这篇书评之所以言辞如此激烈，是因为中国触及作家个人的、私密的部分。中国是一块领地，多亏了父亲传给他的书籍，巴尔扎克自童年起就征服了它，而他的父亲不知不觉扮演了格鲁贤神父的角色。中国是一个帝国，巴尔扎克熟悉它的制度与强权，他对此唯有尊崇与赞赏。中国是一种千年文明，在其他文明之前发明了文人的标志——书写和纸张，而巴尔扎克本身也是一个文人。

因此巴尔扎克根本没有注意到博尔热画册中的插图，尤其是因为这些插图描画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场景以及各行各业：渔夫、理发匠以及农妇……这些插图将中国形象化，而巴尔扎克不愿意、不能看到中国被简化为一种形式，中国应该始终处于梦想与幻想的一边。因此，巴尔扎克为博尔热的画册所撰写的书评名不副实，因为整部画册引起巴尔扎克注意的，只有它的主题；而且在“中国与中国人”这个词组中，他特别强调第一个词语，以便更好地谈论其他事情：揭发七月王朝的政治，贬低法国的风俗现状，哀叹父权的没落。画册

① 巴尔扎克：《通信集》，第V卷，卡尼尔出版社，第747页。

② 巴尔扎克：《致韩斯卡夫人的信》，前引书，第545页。

所描绘的中国是简化了的中国，唯一存在的中国是《爪哇之旅》的作者心中的那个中国，是他继承得来的那个中国。

尽管巴尔扎克和博尔热一样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通过在文字中呈现中国，通过将中国迷塑造成典型人物，通过购买最奢华的中国物品，他比贝里的画家更好地把握了中国。因此他的朋友的旅行并没有怎么改变他的中国观，因为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中国不是一个具有经纬度的国家，不是探险家、大使、商人、画家或者蹩脚的博物学家抵达的土地。中国是一个空间，植根于巴尔扎克遥远的往昔，打开了他想象的大门，他在中国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作为文学的中央帝国的君主、作为“在中国东征西讨”的拿破仑的影子。